



Dai Fudong

戴复东 建筑学与建筑设计专家。1928年4月25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安徽省无为县人。1952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教授。提出了“建筑是生存与行为的人工与自然环境，宏观、中观、微观应全面重视，相互匹配，首重微观”全面环境观的设计思想，设计中崇尚“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精神，富有创新精神。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做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建筑设计。此外，在医院建筑、航空港建筑、高层超高层建筑、旅馆建筑，文化建筑等研究及实践方面也富有成果。重视乡土建筑与文化研究，其中海草石屋的北斗山庄化腐朽为神奇，获得国内外赞誉。设计工程86项，大型规划2项。获省部级一等奖4项。发表论文108篇，出版专著7部、译著1部。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11月(20世纪末)，我成为了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我百感交集，老泪纵横。立即写了一首诗，敬赠给我在贵阳花溪清华大学读书时的校长唐宝心先生和夫人陈琰老师，表达我向他们和学校的感激深情：

凡苗有幸入清华，
 养育精心壮嫩芽。
 虽逾古稀花易果，
 师恩铭记永无涯。

1940年，我在广西省全州县小学毕业。父亲到贵州省贵阳市以西的安顺县，于是母亲带

我和弟妹到贵阳市，我考上了贵阳市花溪镇的清华中学。这所中学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清华大学在贵州的校友们为报效祖国培养人才而创办的一所中学。它沿用了清华大学的很多好东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校训，校歌也是清华大学校歌曲调，仅结合时间地点，文字略作修改，此外“诚实、自立、助人”也是学生们自觉遵守的准则。学生们一律住校，进行准军事训练，并很重视日常的体育锻炼。起先，我家在贵阳，花溪到贵阳有18公里路，周六下午放假，师生步行到贵阳，周日下午步行返校。这样步行也就成为我的一种喜好。两年以后，家搬到了花溪，我就有机会接触到农村、农民和农民的孩子，小学生们上学、放学，身上都背个背篓，沿途拾些柴棍或有用之物，下午放学回家，在水沟中捉些鱼鳅等，回家自食或喂猫、狗。这种必须走路，但可以顺便采集有用之物的行为，给我很大教育和启示，也成为我一生学习仿效，作为研究和探索学问的方法之一。由于我在初中一年级时，先父戴安澜抗日战争中在缅甸牺牲，当我高三要毕业的时候，我考虑我是长子，今后要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而在40年代，只有学工科，毕业以后找工作才能有较稳定的生活条件，但我又喜欢胡乱涂上几笔的画画，因此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犹豫不决。陈琰老师知道后告诉我：“去学建筑！”这样我才知道还有建筑这一行，这就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目标，决定了人生的导向。此外，那时考大学，数学考试难度极大。教数学的敬爱的于闰彦老师(天津大学建筑系聂兰生教授的母亲)，在教完我们《范氏大代数》后，留了约四周多的时间，每周2~3次给我们讲解分析数学上的若干难题，教我们如何去识题和解题。炎热的六月下午，人们都昏昏欲睡，但我不知怎么的，毫无倦意，都听进去了。在大学考试时，数学有三个大考题，其中两个是于老师给我们分析过的，这使得我喜出望外。由于家在南京，我考上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建筑系。

进入中大建筑系后,我感到很满意,我们班只有七个学生,初始系主任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在日本著名的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刘敦楨教授,他的中、外建筑史讲学令人眼界大开、神驰内外、心旷神怡。以后,系主任是杨廷宝教授,他是美国潘雪文尼亚大学的硕士高材生,做学生时得过两块金牌奖,数枚铜奖。当时系里高班同学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位都是国宝,后来都做了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即以后的院士)。还有一位老教授童雋,是满族人,和杨先生在美国是同学,设计能力很强,1952年中央大学50周年大庆,展览会上要一张大的校园鸟瞰图,可那时学校基建资料未经整理过,他让我们用最大的图版,为他裱了一张超0#大白水彩纸。他脱去外衣,用一支铅笔和一把丁字尺,很快正确地就完成了校园鸟瞰铅笔稿,然后用水彩画的方法,在一天的时间中完成了正式透视图,令师生们敬佩不已,可是他从不宣扬自己,虽然他的学历和学术经验和刘杨二位教授不分伯仲,但他宁愿作一个布衣身的学者。其他还有各方面的老师,也都各有特色,水平很高,令我感到非常满意。

我进入中大时正是1948年,是南京和全国解放前夕。因为是一位熟悉同学的关系,地下党利用我的家庭地位,有一箱子资料藏在我家中。曾有一次一位不认识的人想闯入家中,向楼上走去,已经上了半层,但被我制止,他就走出去了。这样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地下党的重要材料被安全地掩护了下来;此外,在地下党的教育下,我参加了反美蒋的“四一”学生运动,担任宣传,在路边墙上写标语。当天另一路游行中,有一位叫成宜宾的同学被打伤了脾脏,急需输血,我是O型血,给他输了200CC血,但仍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使我感到很遗憾。1949年,南京解放,不久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此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向党交了心。

1951年夏天,读完了大学三年级,杨廷宝先生给我们联系到北京去参加生产实践的实

习,实习的单位是中共中央直属修建办事处。通过近二个月的实习,使我们收获很大,懂得了学建筑设计不是画画,而是要为人的生活需要,用工程技术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使我开始体会到,设计工作是一桩艰巨的、为人服务的、但又是很有趣的创作工作。

1952年8月,我和同班同学吴庐生(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等被分配到上海同济大学作教师。这时,是全国院系调整时期,德国人办的综合性的同济大学改成了以土木建筑为主的大学。新建筑系是由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杭州美院的建筑系和同济大学土木系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大学有关土建系教师合并成的。这是一个营养丰富的土壤,各校在各地的原生态情况有大小不同的差异。比如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在学术思想上,主要是在建筑方面代表现代主义思想的德国包豪斯(BAUHAUS)学派;而中央大学建筑系主要是美国潘雪文尼亚学派(代表法国波杂—BEAUX—ARTS 学派),主要是重视古典建筑艺术思想的学派;再加上其他各大学各有不同特色,所以我和我爱人吴庐生在这个新环境中就有一个认真地学习、熟悉、理解和磨合的过程。在校党委、校部、系总支和系行政的领导下,在约三年的磨合过程中,在思想上、业务上我受到了不少的深刻教育,我向冯纪忠、金经昌、黄作燊、吴景祥、谭垣等老一辈教授、专家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好东西,为我后来的教学、设计、研究和行政工作进一步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1957年4月,在杭州,为建设华侨旅馆,举办了解放后全国第一次建筑设计竞赛。我也报名参加。由于西湖位于旅馆基地西侧,我们认为应当解决客房以朝南较好,观湖以西向为佳的朝向与景向的矛盾。在解决了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又做出了使得每一间客房都可以看得见西湖景色的、形态比较新颖现代的、具有较大特色的方案。因此,我们的方案取得了和吴良镛先生的方案并列第一名的好成绩。

同年7月,我和爱人吴庐生(现为中国工程设计大师)又参加了波兰国举办的,为纪念二次世界大战中华沙人民英勇斗争作出重大牺牲的“华沙人民英雄纪念物”的国际设计竞赛。我们用建筑的语言,设计了用历史文字、实物及文献教育后人的纪念馆与体现引导华沙人民艰苦卓绝斗争的飘扬旗帜相结合的形态,再用折板形的长廊围成水池庭院,加强永远波动感的沉思哀忆气氛的方案,结果和其他方案获得了方案收买奖。

在1958年6月,我和爱人吴庐生等有机会为湖北省委招待处的武汉东湖梅岭工程设计梅岭一号楼(为毛主席使用)和梅岭三号楼(主席用多功能小会堂、室内游泳池等)。在这一工程中,当时我特别重视建筑是为人使用的目的,不追求豪华、气派、堂皇,而是重视自然与人的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结合,关心人在室内与室外环境以及景观的互动关系,建筑材料就是用当时比较普通常用的材料。我们后来提出这种做法叫“低材高用,普材精用”。所以建筑物朴实无华,但很合乎人的需要,并给人以舒适宜人的感受,室内外空间符合使用者的要求与尺度。由于该建筑位于武昌东湖之畔,建筑物采用了瓦顶坡面,但是,在室内游泳池设计中,我们做出冬至节日太阳可以满照整个泳池;同时在建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用毛玻璃穿孔背面涂漆的方法代替穿孔板,背后空腔内用不怕水的棕枳蓑衣作吸声材料的土办法,来解决现代科技上泳池内壁防水吸声难题。几十年用下来效果据说还是不错的;等等。这些得到了使用者和管理者的好评。在这次东湖梅岭工程的设计中,我们有机会看见了毛主席,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主持工程工作的是一位战争中失去左臂的英雄——朱汉雄处长。他对建筑的态度基本上与我们是一致的,所以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唯有对客房主卧室大小上,他坚持要 $8\text{ m}\times 8\text{ m}$ 高 4 m ,我们认为这样大小的客房住人是不舒服的,双方坚持不下。后来有一次,他

要我们去参加看演出,我们入场子演出已经开始,在黑暗中他领我们坐在了第八排中间的边座。坐定以后,才发现前面都是空的,只有第五排中间坐了一个人,是谁?看不清。一个节目演完,他鼓掌了,从这个姿势上才发现,是毛主席!当时心情异常激动,整个演出结束后,毛主席离开会场时就从我们身边走过,我拼命地睁大眼睛屏住呼吸注视着他老人家,心中升起了无比的幸福感。这时,朱处长跑来告诉我们,卧室是给他用的,这样我们才放下心来,同意了领导的决定。

1983年6月,我由国家公派至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生院作访问学者。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我非常认真地努力学习。在这一期间,每逢闲暇,我身背相机,携带笔记本,乘地铁并徒步在纽约市内、大街小巷、建筑内外、高楼上下,进行参观调研。既拍摄了大量的幻灯片、照片,又勾画了城市内各种风貌,记录了规划和建筑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此外,我就在图书馆借书或在馆内,或在住所认真阅读思考。同时在1983年9月份,在国内钻研的基础上,我写出了*A Brief Review About Hospital Building Synthetic Planning—Marching Forward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eds and Possibilities*(《医院建筑综合设计——向着需要与可能的整合前进》)这样一本介绍医院设计的小书,并呈交给院长,转交给该研究生院的图书馆保存。

1984年春,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获得普立兹克大奖,这相当于建筑设计界的诺贝尔奖。他用这笔奖金设立了一个在美华人学者奖学金。我也报名申请,最后在人数众多申请者的激烈竞争中,我荣获到贝先生设立的第一届奖学金,奖金的数目是二千美元。当时有不少人向我建议买几件大件回国,或是把钱存起来积蓄财富,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用这笔钱,单身一人,用乘坐灰狗公司(GREY HOUND)长途汽车的方式,冒着人地生疏的艰

险,环绕全美 32 座城市作了一次旅行学习。途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一次几乎要丧命。但我能有机会察看了那时美国城市和乡村的现状和环境,以及当时在美国称雄于世的高层建筑情况,这些使我在建筑学专业方面的理论和知识技能有很大的收获和长进。我高兴并感慨地说:“这些是用钱换来的,但也不仅仅是钱就能换得来的。”这样,我取得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

刚到美国不久,我就为一件事烦心。我的父亲戴安澜,是国民党二百师的师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抗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作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战功,但不幸在缅甸壮烈牺牲。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在悼诗悼词中对先父作过高度的评价(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中提到了他的名字。)美国国会根据罗斯福总统的提议,曾授予先父戴安澜将军以“军团功勋勋章”,也称“懋绩勋章”,对他进行表彰。但这枚勋章不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遗失。我赴美前,整个家族要求我去要一张该勋章的照片。我到美国后如何去要呢?向谁去要呢?后来我只好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先生,说明了事情的情况,最后又只能将此信投在了校门口路旁邮筒中。我想我只能如此地尽了我的努力,履行了家庭交给我的任务。谁知出人意料的是,两周后我收到了美国陆军副总参谋长的回信,说明里根总统委托他办理此事,也将当时历史资料的复印件寄给了我,并且告诉我说,美国有关机构将为先父重铸一枚勋章,这使得我喜出望外,收到了勋章后,我填写了一首《忆秦娥》的词来纪念这件事。

忆秦娥

先父以鲜血与生命获得之代表中美两国人民战斗友谊之勋章,失而复得,感慨系之。

千般憾,
宝章不翼肠愁断。
肠愁断,

魂萦梦绕,
暮思朝盼。

“功勋”再铸光华艳,
斯人惠我酬衷愿。
酬衷愿,
时空纵阻,
友谊长灿。

回国后这枚勋章被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借去,直到现在仍在展出中。

1984 年 10 月回国后,我担任了同济大学建筑系的系主任,到 1986 年建筑系扩大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我又担任了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了将我在国外学习到的知识,结合我国和同济大学建筑系、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具体情况,在 1985 年初,我提出了“建筑是为人服务的生存与行为的人工与自然环境。宏观、中观、微观应全面重视,相互匹配、首重微观”的全面环境设计观的教育与设计思想。在这个思想基础上,1986 年初,我在系原有的城市规划、建筑学、风景园林三个专业之外又成立了“室内设计”、“工业造型设计”两个专业,希望系和学院在全面环境观的指导下,能有研究并实践全面环境的系和学科,并使各专业的师生都能互相了解、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及早树立互相匹配的观点。此外,一方面我虽重视理论,但我也很重视设计实践。我认为这是培养大量学生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根本目的、方法和手段。同时,我认为建筑设计是建筑师的看家本领,我自己也积极参加各项不同的建筑设计工作。我提出了:“我有两只手,一手要紧握世界上先进事物,使之不落后;一手要紧握自己土地上生长的、正确的、有生命力的东西,使之能有根。创造条件,使两只手上的精华结合起来,往前走一步,去创造出有科技内涵、有文化深度、宜人的、动人的美好建筑环境和事物。”同时在设计中提出了,要体现出“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的精神。同时我很重视设计要

“突出新意、重书卷气、永远富有创新锐气”。这些,是我多年来实践的经验积累和思想小结。

此外,在长期的工作中,激起了我在建筑设计和理论方面的广泛兴趣,设计以前及以后,我广为收集资料,进行思考和总结。如宾馆建筑、医院建筑、航空港建筑、旅游建筑、高层超高层建筑等等,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校图书馆的外国建筑杂志上,看到了我国航空港事业落后了,我就徒手描绘了大量国外新机场图文资料,粉碎“四人帮”后,这些手工描绘的资料由建工出版社出版了《国外机场候机楼》一书。此外由于我年轻时在西南花溪落后地区生活过,因此我还非常重视乡土建筑和建筑文化的研究。1988年,在当时省委书记朱厚泽同志和市长赵西林同志(都是我中学时的同学)的支持下,我在贵州省的中部地区周游了不少地方,写下了《贵州岩石建筑》一书。

后来我在山东省威海市荣城地区,考察了当地渔民利用海草及当地石材建成的海草石屋后,向当地领导极力推荐,建成了布局上类似天上七星的“北斗山庄”,受到各级政府和人们的赞许和欢迎,被有些人称誉为“化腐朽为神奇”。

90年代下半期,我受到邀请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大会堂的建筑方案设计竞赛,我将广西地方建筑风格糅合了进去,获得了一等奖,但可惜没能按这一方案建造。此外厦门有一位台商投资者,要建造一座乐园,也邀请我参加设计竞赛,由于它位于厦门很大的湖面外围,而湖的四周已被其他建筑占满,我设计了一个山岩形的建筑,结果也获得了一等奖,可惜也没按这方案建造。

1997年,我从第一线退下,学校批准我成立了一个高新建筑技术设计研究所,我一面进行设计工作,一面对住宅产业化开展研究。

进入21世纪,我又受到残疾人坚忍不拔毅力精神的激励和感染,我和吴庐生设计了我中国第一个残疾人培训用房——“上海中国残疾人体育艺术培训基地——诺宝中心”,经过多方面

的探索,摒弃了直线形走廊的旅馆客房的平面,最后采用有中庭圆形平面,解决在客房走廊上能便于与聋人互通信息的联系办法;同时又设计了与前人不同的室内游泳池,空间感受很流畅,但体量较一般室内泳池小,可以节约用能。在室内游泳池的结构中,由于规范上有防火要求,实际使用中怕水防锈的需要,我们向武汉钢铁公司提出这一要求,他们以副总工程师陈晓教授为首的技术中心炼出了世界上无先例的耐火耐候钢,并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以在室内游泳池中应用。对整个建筑,要做到“残疾人殿堂、残、健可共享”,受到了残疾人和健康人的喜爱。荣获2006年度上海市建筑学会第一届建筑创作优秀奖(最高奖),名列第一。

2003年,武钢技术中心要建新楼,我们参加了方案竞赛,被选中,我们提出并设计了世界第一例17层的耐火耐候钢结构的大厦,又克服了重重困难,2006年秋天竣工。获2007年度上海市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

2001年初,我自己家乡——安徽省无为县的地方领导和开发商找我,要我为他们再设计一个文化广场,性质由我决定。经过我深思考,我的家乡是安徽省沿长江的农业大县,但农民实际上被重视得不够,我觉得应当歌颂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农民和农业,于是我设计了,并在2006年春天建成了歌颂我国农业和农民的“农文化广场”。其中有用白色大理石巨型石壁,正反十个壁面上,镌刻了26首我国历代有关农民农业的诗词,和五组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各个过程的大型铜雕像,屹立在广场范围内,歌颂了我国有史以来农民不朽的历史功绩,受到了地方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赞赏。

2004年,我和吴庐生又设计并建成了杭州浙江大学紫金港新校区中心岛组团建筑群规划与设计,人们很喜爱它的形态新颖、有现代感和地方氛围,我们很高兴。获得2008年上海市建筑学会第二届建筑创作佳作奖。

2001年初,安徽省芜湖市弋矶山医院(前

身为我国较早的一个教会医院),要我们为它们设计一个1000床以上的医院病房楼。我们用现代医院的理念,给他们做了十几轮的方案。我们已完成了施工图纸设计,正投入施工建造。

2002年夏天,芜湖有一位开发商在一块较小基地上造一座宾馆,两幢公寓和相当数量的商店,要我们参加建筑方案的设计竞赛,我们参加了这一活动,认真仔细地进行了设计,最后我们的方案中选。但由于投资者有自己的要求,地方领导与规划部门有各种规定,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探索、磨合,基本取得了共识。2006年春节后开工,由于资金不畅,现仍在施工中。由于设计难度大,我们将设计做到既符合地方要

求,又做得不一般化,功能很复杂,我们希望能取得好成绩。

长期来,我们的思想、工作、研究的座右铭是:

坚忍不拔地追求,
执著勤奋地探究,
清醒周密地思考,
顽强谨慎地奋斗。

虽然我已80岁了,但仍希望我还能继续不断地为我国建筑事业再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因为设计并建造着既能为祖国奉献微薄之力,同时也是极大的快乐!

青锋恣忍滋锈迹,
伏枥永怀万里情!